

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的建设实践及历史启示¹

吴晓荣 万振凡

在农村衰败到惊人地步的背景下和艰难困苦战争环境中，闽浙赣苏区从精神动力、物质条件、群众基础、工作方法等方面构筑起一套“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将闽浙赣苏区建设成为当时全国苏维埃区域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在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人民军队建设等方面创造了“一等工作”。闽浙赣苏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诸多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闽浙赣苏区；赣东北苏区；方志敏；苏维埃；模范省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12—0111-10

闽浙赣苏区（也称“赣东北苏区”）^①，在中国革命史、苏维埃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六大苏区”之一，受到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全国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迄今国内外对闽浙赣苏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闽浙赣苏区通史、某个领域建设成就与经验，以及对方志敏等革命人物的研究方面，系统性、专题性研究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建设的成果则非常少见。^②对这一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不仅对进一步推进苏区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我们以“作示范、勇争先”的昂扬斗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建设的基础和环境

任何社会样态都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也是在一定环境之中形成的。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方志敏曾深有感触地说：闽浙赣苏区建设是在“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1] (P12)}基础上，在“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1] (P49)}的战争环境中逐步展开的。方志敏的记述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闽浙赣苏区苏维埃模范省建设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建设基础看，革命前夜的赣东北农村社会非常落后，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建设基础非常薄弱。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比较客观地揭示了自己家乡——江西弋阳的社会落后和黑暗。他指出，当时弋阳的政治黑暗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令方志敏印象最深的是，漆工镇警察所一个警察，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集于一身，成为当地的独裁魔王。经济上，赣东北地区土地占有不均现象非常严重，农民遭受沉重的地租剥削，在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的压迫下，生活穷苦不堪。文化教育方面，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很低，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医疗卫生条件也极差。以方志敏老家所在湖塘村为例，“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蚁，到处蠕蠕地爬动”^{[1] (P11)}。在这样恶劣、污秽的生存环境下，患各种疾病的人自然不少，对社会生产和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如果说，方志敏对赣东北农村社会的观察结论，是他从革命者视角观察的结果，有可质疑之处，那么，站在革命对立面的

¹ 基金项目：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重点课题“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建设与方志敏革命精神研究”（22ZXHYZ10）

吴晓荣，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万振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 330022）

国民党方面也是这种结论，则可进一步证明上述情况就是历史的事实。据 1931 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的材料记述，这一时期农业经济整体呈急剧衰落之势，表现有三：一表现为农产物衰落；二表现为荒地增加，耕地减少；三表现为小农经济之急速溃灭。^{[2] (P11)} 可见，受 1929—1933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赣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农村、农业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基础上要脱颖而出，创造苏维埃“第一等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当然，唯如此，方更显模范本色。

其次，从建设环境看，闽浙赣苏区始终处于残酷、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中，其模范省建设环境非常恶劣。

在苏维埃模范省建设起步阶段，赣东北苏区面临十分恶劣的战争环境。方志敏在回忆他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涯时特别强调，1928 年是“极端艰苦奋斗之一年”，敌人重兵包围，不间断地“围剿”苏区军民，弄得连藏身地也很难找到，白天只能躲在山上隐蔽之处，即使晚上也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偏僻的小路，房屋不能住，只能住在树林里、岩石下或水沟里的茅蓬里，“一天要跑几次兵，晚间躲在茅蓬里睡觉，也得留心警戒，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3] (P46)}。环境的残酷和艰辛令常人难以想象。

不唯起步艰难，战争更是苏区的常态。干革命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敌人的烧杀，尤其是抱有报复心理的反动军队和豪绅地主，对苏区往往是“大烧大杀”^{[1] (P38-39)}。弋阳成立过农民革命团的 71 个村，“被烧去了六十八村，有的全烧，有的烧去十分之八九，有的烧过四五次的，只剩三村未烧”^{[1] (P202)}。由于敌人的烧杀抢掠，赣东北苏区的房屋、耕牛、农具、日用品和粮食等损失惨重。战争导致农村生产力快速下降，“赣东北苏区的农业生产，比较革命前约减低十分之四，许多好的田地山林都荒芜了，成为废地”^{[3] (P98)}，民众因战乱常有饥荒和逃亡。可以说，苏区建设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

闽浙赣苏区一直处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厉的封锁之中，得不到一点外援。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所有经过信河的船只，现已全部停运”，“一切的货物，尤其是食盐、布匹、五金，都不准贩卖苏区”。^{[3] (P117)} 在这一政策之下，国民党还实行严密的保甲制度和食盐限购制度，意图阻断苏区与白区的联系，并在经济上困死苏区军民。同时，苏区同上级党组织经常处于“失联”状态。在赣东北特委领导下时，信江特委的报告中反复提到，当时的省委不了解信江的革命斗争情况，信江未得到上级党组织尤其是省委的指示精神，赣东北地区的斗争策略和各种工作，完全是靠几个负责同志计划出来的。^{[3] (P40-42)}

面对落后的建设基础和残酷的战争环境，闽浙赣苏区军民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知难而进，勇于前行，从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而且“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1] (P50)} 彰显了苏区军民在困境中顽强抗争、艰苦奋斗的精神特质和奋勇拼搏、争创一流的英雄气概。

二、通向苏维埃模范省之路

在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闽浙赣苏区党和苏维埃政权是怎样将苏区建成“苏维埃模范省”的？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称号。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4] (P140)} 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当时对全国苏区建设情况最关心、最了解的人，他的论断是值得采信。从毛泽东的语境中，我们大致可勾勒出闽浙赣苏区创建苏维埃模范省的主要理路：发挥创造精神、注重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同时解决，从而在不长的时间内将落后的赣东北农村建设成为全国的苏维埃模范省。

（一）发挥创造精神

闽浙赣苏区军民之所以能将落后的赣东北农村建设成“苏维埃模范省”，首要是因为苏区军民充分发挥了创造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敢于直面风险挑战，攻坚克难、知重负重，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惧无畏的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当时，苏区均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又“处于敌人四面围攻和封锁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对此，方

志敏感叹：“这种困难，在其他任何政府，都是没有方法解决的。”然而，苏维埃政府具有极大的创造力量，“它能从各种困难中，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1] (P84)}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敢于超越他人，大胆地走自己的路，创造新的事物。闽浙赣苏区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如：创建了全国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新、旧红十军，发行了根据地史上第一支红色股票，建设了党史上最早的列宁公园，开展了红军史上最早的地雷战，等等，“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1] (P83-84)}。创造精神为闽浙赣苏区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推动闽浙赣苏区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这种创造精神，闽浙赣苏区到处都有“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做出了第一等的工作成绩，创造了全国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二）注重经济工作

1933年3月18日至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横峰葛源召开，会议充分认识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对革命与战争的重要意义，会上通过的《关于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强调：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直接影响到军事与行政工作，影响到整个社会与整个阶级政权的稳定，尤其是大规模革命战争激烈开展的时候，经济发展“对于争取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是含有决定的重要意义”^{[5] (P384)}。为此，闽浙赣苏区采取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发展苏区经济。比如，在农业方面，采取组织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保护和繁殖耕牛、搞好农具供应和修理、鼓励表彰生产模范、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等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方面，创办大量的工矿企业和工厂，包括煤矿、铁矿、发电厂、造纸厂、硝盐厂、榨油厂、织布厂、织袜厂、农具厂、木船厂、中药厂等，基本上形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金融业方面，1931年2月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通过统一货币发行、吸收社会游资、发放贷款等措施，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经济建设。商贸方面，1931年，先后在各县建立19个对外贸易处，积极开展赤白贸易，把苏区盛产的木材、毛竹、香菇、皮毛、粮食、土纸、茶叶等土特产，运输到白区出售，又从白区换回苏区所需布匹、食糖、西药、煤油等。赤白贸易的开展既增加了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满足了苏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三）关心群众生活

方志敏提出，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积极地为着工农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积极地为改善全省工农兵劳苦群众的生活而斗争”^{[1] (P369-370)}。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闽浙赣苏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劳苦群众实行最高程度的民主。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农民的最大利益。苏维埃政府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解决了农民长期不曾实现的土地要求，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为解决农民经济困难，政府借钱帮助农民购买耕牛、置办工具或做小生意；为满足人民群众物资需要，成立贸易处和各类合作社，解决苏区群众对食糖、西药、煤油等紧缺物资的需求；为解决群众看病问题，设立工农诊疗处，免费为群众看病治病，并开办工农药店，廉价卖药给群众治病，以减少农民医药费支出；等等。闽浙赣苏区关心群众生活体现在各个方面。正是由于关心群众生活工作做得好，因而赢得苏区人民的心。方志敏指出：“因为如此，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与拥护，日益增高，他们诚心地服从苏维埃的指导……他们宁愿牺牲一切，帮助苏维埃，他们爱护苏维埃，比爱护他们的家庭还更恳切。”^{[1] (P86)}

（四）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

1933年3月召开的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正处在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更加向前发展的形势之下，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一切工作环绕着战争，服从战争”^{[5] (P372-373)}。为支援和服务战争，闽浙赣苏区强调要进一步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切实解决好土地、粮食、劳动保护法执行、文化、教育、卫生、交通和老弱病残及灾民救济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问题，始终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对此，毛泽东赞扬闽浙赣苏区，“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如何去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去参加国内战争……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生活”^{[4] (P140)}。比如，关心工人们的生活。据史料记载，在苏区，“一般的工人生活，是相当的改善了。在国营企业中，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一般都实现了”^{[3] (P141)}。“工人生活，更比以前好多了，工人都有宿舍，房屋都是从土豪劣绅没收来的，是最好的。被服、伙食是由公家

供给。”^{[3] (P143)} 这种关心深深赢得了工人们的心，因而工人们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战争。他们努力工作，造出更多的枪、弹、军装、日用品等，以满足战争需要。在扩红运动中，工人也是积极参与，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33 年 1 月，闽浙赣省总工会决定“自‘二七’起到‘五一’止，组织一无产阶级团，实行有组织的有训练的输送大批工人雇农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基础”。同年 3 月 18 日，第一批参加红军工人团的工人，实到 409 人，超额 90 人。^{[6] (P479-483)} 很快又有第二批工人参加红军工人团。苏区的工会会员普遍实行半革命化，工人自愿组成的工人赤卫队、游击队等后备武装组织，一有需要则立即上前线配合红军作战。

（五）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同时解决

提出工作任务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但仅仅提出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套去做，结果一定是什么任务也实现不了。在工作方法上，闽浙赣苏区党和政府坚持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原则，在提出工作任务的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1933 年 4 月 30 日，为健全乡苏维埃工作，方志敏起草并以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名义下达各地执行《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文件提出苏区目前有扩大红军等 8 项工作任务，同时也提出具体的落实工作任务的 5 大办法。比如在“怎样执行一切工作”部分，文件明确规定了苏维埃执行一切工作的三步方法：第一步，政治动员，上级政府发下的命令、训令和决议，各乡苏代表应详细讨论，得到彻底的了解，就回去向群众报告与解释，使每个群众都了解苏维埃一切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鼓动群众热烈地自愿地来执行一切工作。第二步，加强贫农团在群众中执行工作的领导，一切工作，首先要经过贫农团会议，动员全体贫农团员首先执行，使每个团员都能在群众中起执行工作的领导作用。第三步，乡苏代表以身作则——去执行一切工作时，每个乡代表，都要有冲锋突击的精神，以身作则。每一步都体现了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的原则。^{[1] (P420)} 方志敏深有体会地说：“赣东北的群众工作，我认为在全国苏区中不是落后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的。”^{[1] (P110)} 方志敏将这进一步归结为党的群众工作的深入和刻苦，并召开党员干部要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坚决地站在群众面前，领导群众斗争。

以上 5 个方面构成一套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有效机制，其中，创造精神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提供强大动力，重视经济工作则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关心群众提供了物质条件，加上闽浙赣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同时解决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这样就从精神动力、物质条件、群众基础、工作方法等方面，构筑起“争创一流”的完整机制。依靠这一机制，闽浙赣苏区走上了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通途。

三、闽浙赣苏区苏维埃模范省的模范呈现

所谓“模范”，是指值得学习的楷模和推广的典范，其具有时代性、先进性、感召性等特点。苏维埃模范省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物，承载着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理想社会的政治诉求，体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比较优势。经过艰苦努力，到 1932 年前后，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的模范性逐渐显现出来。

（一）党的建设的标杆

闽浙赣苏区之所以能成为“苏维埃模范省”，其根本原因在于闽浙赣党组织始终强调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坚强的自身建设引领苏维埃模范省建设。

赣东北地区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方式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在党成立初期，赣东北地区党组织依靠血缘、地缘、学缘等关系发展党员，依靠本地党员的力量发展壮大党组织，成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地建立后，又始终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从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加强建设，建立坚强的基层党组织，同时强化党政军干部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为革命提供优秀人才支持。1932 年，中共赣东北省委先后两次专门巡视葛源小组工作，对葛源小组组织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提出整改的具体方针，强调要结合实际转变开会方式，开会和报告时间均不可过长等^{[7] (P515-520)}，进一步规范了苏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苏区还特别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要“使每个党员成为有实际有理论的布尔什维克

党员”^{[8] (P678)}。1928年春，赣东北地区党组织在革命兴起之初就认识到党员对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性，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发展需要，按照党章要求，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地方观念、家庭观念和雇佣观念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制订《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提出包括“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对党忠诚、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接受批评、永不叛党”在内的22条标准，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这22条标准是闽浙赣苏区在党的建设方面又一独特创造，成为闽浙赣苏区广大党员的行动准则和座右铭，推动根据地波浪式向前发展，苏区日益壮大蓬勃兴盛。在革命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赣东北苏区面临干部稀缺、素质不商、能力较弱等问题，方志敏等人还立足于赣东北苏区的实际，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与实践。对此，有学者研究指出，方志敏通过“干部增量：积极应对干部稀缺”“干部提质：全面应对干部质弱”“肃反持度：以初心和公心维护团结干部”^[9]等方式来推进干部队伍建设，为党和革命事业打造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样板

作为闽浙赣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方志敏始终强调，“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莫克拉西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1] (P83)}为达此建设目标，从赣东北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励精图治，刻苦努力，探索建立了一个具有闽浙赣特色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到1932年12月，闽浙赣省的省、县、区、乡4级政权体系已完全建立，其内设机构和功能也日益完善，一个相对成熟的红色政权屹立在闽浙赣的大地上，并具有“苏维埃的民主精神”等5种进步精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农群众掌握政权，参与政治，特别是在基层政权中，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处理各种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有条有理，增强了政治意识，提升了参政议政能力。清正廉明在闽浙赣各级党和苏维埃干部中蔚然成风。他们刻苦耐劳，不怕困难，孜孜不倦地为党、苏维埃和人民工作。方志敏就是典型代表。在领导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革命实践中，方志敏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心中最高位置，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坚持奋斗创造、清贫奉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闪亮的坐标，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闽浙赣苏维埃政府，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相对于贪污腐化、敷衍塞责的国民党政权“要高明几百倍”^{[1] (P84)}。

（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榜样

查阅闽浙赣苏区不同时期的土地法及相关土地政策文件^⑧，我们可以发现闽浙赣苏区土地分配基本原则与中央苏区并无二致。但闽浙赣苏区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出有创新性的土地分配办法。一是明确提出土地分配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分配土地问题，而是如何增加土地的生产，如何改善群众的生活问题。二是适当分给地主富农土地，让他们得以生存。三是照顾中农的利益，“在分配土地中……一切违反中农利益的倾向和行动，省苏都予以严格的纠正”。^{[1] (P377)}1933年1月，方志敏总结闽浙赣苏区土地革命情况，强调土地革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地主富农分好田、团结中农、分田后如何增加土地的生产、懒人分田后不种田、分得山林后乱砍滥伐不加保护、妇女参加生产、水利建设、奖励种植棉花等，苏维埃政府都采取了针对性措施，最终“省苏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问题”^{[1] (P377)}。这些细节问题的解决，说明闽浙赣苏区土地分配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深入。1933年3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发来贺电，赞扬闽浙赣省：“在深入土地革命方面……有了极伟大的成绩。中央对于你们的这些成绩，是非常满意的。”^{[8] (P606)}

（四）苏维埃经济工作的楷模

闽浙赣苏区经济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和表扬。其模范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闽浙赣苏区比较早地运用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1934年1月，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4] (P134)}二是闽浙赣苏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红色中华》多次发文，报道闽浙赣省农业生产的成就，指出闽浙赣苏区谷子、棉花、油菜籽等有大幅增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革命后有很大的提高。^{[10] (P2680、P2599)}三是工业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闽浙赣苏区建立了适应革命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评价说：“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

效。”^{[4] (P132)} 四是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成绩引人注目。毛泽东表扬闽浙赣苏区实行商业贸易工作较早，设立对外贸易机构，有组织地开展对外贸易，流动适应群众生活和战争需要的商品，“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4] (P132-133)}。五是在经济上给予中共中央极大的支持。从1930年到1932年，赣东北苏区给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共输送黄金1000多两，还有大量的银元，对当时的中共中央解决财政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10月4日，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发来指示信，赞扬闽浙赣省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指出“其中有许多经验是可以让其他苏区参考与学习的”。^{[8] (P606)}

（五）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表率

文化是一个地域软实力的体现。闽浙赣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成效显著。1932年秋通过的《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明确提出了“政治化的、社会化的、劳动化的文化教育”的“文化教育总的方针”。^{[11] (P576)} 为加强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闽浙赣苏区省、县、乡都设立了文化部，具体负责文化教育工作。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每年都会从财政拨出大量经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尽管处于战争环境，闽浙赣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仍得到全面发展，创办了列宁小学、党校、共产主义学校、军校、团校、红色医务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列宁师范学校、工农补习夜校等教育组织，形成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职业教育等组成的较为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1933年1月，闽浙赣苏区共建立列宁小学163个，教员170名，学生5583名；工农补习夜校212个，学生6615名；识字班357个，参加人数3664名；俱乐部254所，会员2322名；农村壁报331个；读报会760个；红色新戏团团员39名，公演颇获得各地群众的欢迎。^{[1] (P385-387)} 到1933年8月，这些数据又有新的增长，“乡俱乐部达到357所，参加工补人数达到2万人，参加识字班的人数达4万人，列小学生达到10105人，固定读报者达到10万人”^{[12] (P74)}。在落后的基础上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中，闽浙赣苏区能够取得上述成绩，具备这样的文化实力，不仅在国统区不可思议，就是在各苏区中也是走在前列的，当之无愧称得上是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表率。

（六）人民军队建设的典范

1934年2月，方志敏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中提出：建设我们铁的红军，是第一等的中心任务。他提出加强红军政治工作、提高战士军事技术技能、加强红军纪律建设等7条建军措施，展现了方志敏和闽浙赣苏区在军队建设方面的独创性思考和创造。^{[1] (P445-446)}

在方志敏建军思想指导下，闽浙赣苏区形成正规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先后建设两支主力红军——新、旧红十军，而且还有赤色警卫师、闽北独立师、赤警团；各县的赤警连21个、红色游击队100多支等地方红军，还有共青团员21172名、赤少队60357人以及约10万群众参加了地雷队或作战队等群众武装，战时配合红军作战。

闽浙赣红军是严格执行“党指挥枪原则”的模范。1933年1月，党中央命令红十军划归中央苏区，立即开赴中央苏区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方志敏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呕心沥血创建的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并立即开赴前线作战。为减轻中央红军压力，1934年11月，中央电令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向国民党腹地——宁沪杭方向进军。向国民党统治中心孤军奋战，必然凶多吉少，但方志敏坚决表示：“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1] (P93)} 方志敏毅然率军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国民党部队不得不分出大批兵力应对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压力。地雷战是闽浙赣苏区军民了不起的创造。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均专门设立地雷部，乡、村普遍成立地雷队，男女老少几乎都会造雷和用雷。地雷种类繁多，在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34年4月，中共中央号召各苏区，“利用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充分使用挨丝炮、拉丝炮等各种各式的地雷，轰炸进攻的敌军”^{[13] (P377)}。闽浙赣苏区军队后勤建设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设立红军学校、红军医院、兵工厂、军用被服厂等，不仅及时地培养合格的红军军事、政治干部，而且基本上能供给部队所需的军被、军服、军旗、军帽和绑腿等，较大地增强了闽浙赣红军的战斗力。正是因为闽浙赣红军坚强的战斗实力，1935年8月，共产国际在有关文件中，把方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称之为“中国红军之父”“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14] (P365)}。

总之，闽浙赣苏区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综合实力位于全国各苏区前列，被确定为“六大苏区”之一和全国苏维埃区域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这种强大的综合实力，对当时尚处在劣势地位的中国革命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使闽浙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有力的右翼和东北屏障，成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强力抗衡的坚固的红色阵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称赞赣东北苏区是“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15] (P161)}。

四、历史启示

闽浙赣苏区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建成苏维埃模范省，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苏维埃模范省的6大模范性特征，是苏维埃革命的时代产物，体现了那个时代党和人民的需要，代表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方向，是其他苏维埃区域学习的楷模，也为我们今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了诸多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们要对标新时期党中央“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树立明确的目标定位，擘画好发展蓝图，学习借鉴闽浙赣苏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经验，以“作示范、勇争先”的昂扬斗志，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努力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面对落后的建设基础和残酷的战争环境，闽浙赣苏区军民并没有退缩，而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在历史大潮中主动作为、勇毅前进，勇于创造、善于创造，终将落后的闽浙赣苏区建设成为“苏维埃模范省”。奋进新征程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埋头苦干、担当作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二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构建“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闽浙赣苏区注重发挥创造精神、注重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同步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等，构建起整套“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打下坚实基础。奋进新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扬创造精神，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把关心群众生活和当前中心任务联系起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大团结大联合中，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三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坚持“把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工作方法。闽浙赣苏区的群众工作之所以被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称赞为模范，方志敏认为：“并不是闽浙赣群众有什么特殊性，主要的是由于党的群众工作之深入与刻苦。”^{[1] (P110)}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原则，避免只提任务、不抓落实的做法，必须深入群众，在提出任务的同时，提供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理念，练就服务群众过硬本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融入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切实推进各项工作。

四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始终勇于自我革命。闽浙赣苏区之所以能取得苏维埃模范省的光荣业绩，在于有一个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敢担当、善作为的党组织。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闽浙赣共产党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从严管党治党，强调要“十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突出从思想上建党，强化组织、纪律建设及作风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形成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奋进新征程途中，我们必须始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在任何风险考验面前始终做到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参考文献

-
- [1] 方志敏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2] 江西经济问题[Z]. 南昌: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 1931.
- [3] 江西省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5] 江西省档案馆.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6] 江西省总工会, 江西省档案馆. 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7] 江西省档案馆.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8]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9] 金姣. 方志敏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再探[J]. 苏区研究, 2022, (4).
- [10]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中央档案馆. 《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第5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 [11] 上饶市档案局. 赣东北苏区档案史料汇编:下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
- [12]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4]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 方志敏年谱[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 [15] (美)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M]. 董乐山,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注释

①闽浙赣苏区的前身是1928年4月成立的中共弋阳县委和5月建立的弋阳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2月发展为中共信江特委,并于10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1931年3月扩大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9月成立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赣东北省委改称闽浙赣省委。因此,本文行文时,1932年11月前称赣东北苏区,1932年11月后称闽浙赣苏区。但历史文件中有明确称谓的,以历史文件本身的称谓为准。

②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唐志全、陈学明《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上饶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闽浙皖赣苏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庞振宇《闽浙赣苏区政权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毛智勇《闽浙赣苏区党的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周萌《方志敏与苏维埃运动的实践探索》(《光明日报》2021年3月3日),刘国云、吴晓东《方志敏对党的绝对忠诚》(《苏区研究》2019年第9期),万振凡《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及其机制探析——以方志敏坚守理想信念为个案》(《苏区研究》2021年第3期),等等。

③主要有:1930年3月23日颁布的《信江特区苏维埃土地临时使用法》,1931年10月31日中共赣东北省委《土地分配的新规定》,1932年2月25日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和问题》等。